

【史海钩沉】

清代乾隆年间山东运河抗洪往事

□刘永加

黄河决溢殃及运河

乾隆二十六年，河南、山东一带春季雨水较往年增多，到六月中旬后，连次大雨如注。黄河下游本就泥沙淤积，河床抬高，成为“地上河”，连续的大雨使得洪水泛滥，导致运河河水涨溢，险情不断。

据山东布政使崔应阶八月十三上奏朝廷：“东平州寿张县因濮州等之水漫入县境，于初三日由赵王等河溢入运河，长发出槽，下注东阿、东平以入盐河，一时骤难宣泄，州境友智等堡田禾被淹。”阳谷县也汇报：“县境因濮州等处之水由寿张入境，下归运河来水过多，运河不能容纳，以至拍岸迎槽，漫及堤顶，在在危险，分头抢救不及，于八月初五、初六，运河西岸官窑口涵洞并相连之河堤，以及郎寨湾、三济桥东岸河堤漫溢十余丈不等，近堤之十一都等里田亩被淹。”

由此可见，此次水灾是由黄河决溢进而波及运河。对此，山东巡抚阿尔泰有专门的奏报：“臣查被水之州县卫，唯曹县、成武黄水经过之地田庐淹浸，成灾较重。其次则济宁、金乡、鱼台。”显然，曹县、成武县受灾更加严重。

乾隆接到奏报后极为重视，批示道：“今览阿尔泰所奏，看其情形稍重，现在粮艘陆续回空，帆樯络绎，若不迅速堵筑，何以儻行无滞。”

运河关系漕运，因此治黄必须兼及治运。洪涝发生后，乾隆一方面督促地方官员及时奏报，一方面派仓场侍郎裘日修等亲临各处决口，视察灾情。此外，还命江南河道总督高晋赶往协助办理，并从江南带去几十名熟练河工，以解决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。

对于各处决口，根据危害程度先后进行处理，尤其是曹县、杨桥两处漫口，“现在东省漫口，张师载等先后折奏，渐已消减，尚易从事，唯河南杨桥夺溜，实为全河第一关键，急宜及早堵筑。”张师载是当时的河道总督。显然，杨桥决口危害程度大，易于使其下游黄河断流，

清代黄河改道山东后，因黄河时常决溢，造成运河山东段经常发生洪涝，甚至严重影响了漕运。尤其是乾隆二十六年洪涝灾害极为严重，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，使漕运迅速恢复正常秩序。



清代运河东平段示意图(据清代《山东运河全图》)。

因此动用了更多的人力、物力优先修筑杨桥漫口。由于集中了各方力量，使得工程得以按期完工。

朝廷对于运河山东段的治理极为重视，应修筑、疏浚之处，均照以工代赈之例进行。所应修建的工程，其一是哨马营、四女寺展宽疏浚工程，其二为五空桥落低并辛庄建坝工程，所需钱粮“在运河道库酌拨节省项银内，咨部动用司库地丁钱粮”。这两项工程均于乾隆二十七年如期完工。

其实，在此次洪涝灾害以前，山东运河几乎年年兴工，乾隆二十年以后兴建的山东运河工程很多，如，“（乾隆）二十年，建张秋平水三闸，河溢孙家集，微山湖淤，接筑拦黄坝七十里；（乾隆）二十二年开伊家河，改杨坝减水为双槽石闸；（乾隆）二十三年，筑微山湖西岸坝工，张秋八里庙滚水坝……（乾隆）三十六年伏秋汛涨，重修戴村坝；（乾隆）三十七年，堵白马河董家口坝……”

这些工程疏堵结合，乾隆二十八年以前以“疏”为主，即疏通运道及其支流，以保障运道畅通，漕运无阻。此后阶段所修工程以“塞”为主，即经过前一阶段的疏通，运道水量充沛，极易为患，因此修建工程都为闸坝，以防止水患。经过这些疏通运道工程的实施，使山东运河基本畅通无阻，漕运迅速得以恢复。

修复、加固、疏导运河沿岸城镇

乾隆二十六年这次洪涝灾害，不仅对山东运河造成巨大影响，同时使山东运河沿岸的许多城镇遭遇洪涝。所以，在治理运河的同时，重点对于沿运城镇的险工险段进行了修复、加固和疏导。

在这次洪涝灾害中，济宁州城发生严重水灾。由于济宁州城面积较大，需要疏浚城壕，将洪水引离，才能降低洪涝程度。事先济宁广大

绅民已经挑浚城壕，起到很大作用。洪水来临时，经城壕入玉带河，缓解了洪涝带来的严重灾害。

流经济宁的洸河、府河，汛期水大为患，极易引发济宁州城严重水涝，因此在两河入城前，就建设了好几座减水闸坝，以缓冲上游水势，并将洪水引至他处，减少对济宁的冲击。同时，实施“令洸水不与府河并行入运，亦分杀之一策”等措施，在此后的洪涝灾害中，济宁州城受到的危害较小。

乾隆二十六年这次洪涝灾害，金乡县城被淹惨重，大水灌城，淹没田宅，溺毙百姓。但是，金乡人认为，发生洪涝灾害，地处下游的鱼台县责任重大。原来，金乡县疏浚河道，水流下注进入鱼台县境内后，鱼台县用尽各种方法阻碍河流下注，试图将大水阻挡在鱼台境外，致使上游金乡县洪水得不到正常宣泄，最终导致严重洪涝。对此，鱼台县则认为，鱼台地势低洼，是上游各县泄水归

宿，上游疏浚河道愈勤，鱼台受到洪水侵害愈多，因此，鱼台县认为“疏河者，他邑之利”。直到这次洪涝灾害发生后，鱼台人终于明白。在这次水灾过后，鱼台新任知县以疏浚河道解除水患为重任，本县绅民踊跃响应，同时还一起联合上游的成武、单县、金乡诸县一起浚河、筑堤。

为了保护山东运河沿线城镇不受洪涝灾害侵袭，通过建设、巩固堤防，以抵御洪水，这是运河区域州县城镇堵截洪水十分有效的方法。但是，当时还引发了一些激烈争议，最后经河东总督裁决才得以解决。

武城县为了保护县城免遭洪灾，就在县境修筑毛家堤一道，“延袤三十里，广三丈，高丈许”，该堤起自毛家庄，至西李庄止。毛家堤很大程度上能阻挡、抵御上游所来的洪水，免于武城“一城池之患”。在乾隆二十六年洪涝灾害来临之前，武城县又进一步加固了堤防。

武城县的做法，引发上游清河县的强烈不满，并要求掘毁毛家堤。武城县却说毛家堤不仅仅是为了防护武城一县，更是为了保卫山东运河不受上游急流冲击，避免影响漕运。因此，武城县指责清河县“是徒适一己之便，不顾漕运之重也。”

另外，武城县还在龙王嘴修筑大堤，“立窝铺昼夜防守”，严防上游夏津县偷偷掘堤，这也引起夏津县的强烈反对。

夏津县城西条河一带，位于运河、沙河之间，地势低洼，每年雨季，此地一片汪洋，只能从东北方泄水至夹马营牛蹄窝入沙河。然而，武城县修筑此堤后，直接导致此处积水无法正常宣泄。特别是这次洪涝更是影响巨大。对此，夏津人指责武城人擅自修筑此堤，“私立石碑，雅称古堤”。

无奈，夏津绅民向上申诉，经县、府、道层层上递，最终由河东总督做出裁决，将此堤掘开，并按现存沟道形状，掘出宽三丈，深五六尺不等的泄水河道，这样夏津莲花池等处积水才得以直达沙河入海。同时，还废去武城私立石碑，另立一块石碑，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纠纷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□李学朴

“秤”，在中国古文字中是形声字，禾为形、平为声。“秤”由“称”字变化而来，本意是称量物体的器具。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古人就运用杠杆原理发明了木杆秤。传说秤的计量单位是鲁班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制定的，十三颗星为十三两(229克)，就是一斤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将十六两(256克)定为一斤，并颁布诏书，统一度量衡，秤由官府负责监制。

在我十几岁时，临清锅市街有一个制秤作坊，我出于好奇，经

常去铺子里“光顾”。作坊里有五六个人，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技。制秤手艺人先将木杆粗头钻上两只通透的眼，穿上绳子，配上金属钩子，再挑一个穿上绳子的秤砣，一手拎着绳子，另一手将秤砣挂在木杆上，不断拨动拴秤砣的细绳，当木杆在竖水平线时，就在秤砣绳的位置做上一个记号。然后拿出另一个钻子，开始钻眼，这个钻子也是一根木杆，木杆的下方是金属的，上方是一个小圆盘，圆盘下垂着两根对称的细绳，细绳分别绑在一根横杆的两头。制秤人握住木杆和横杆，转了转木杆，绳子螺旋状地缠绕在木杆上，将金

属头对准记号，催动横杆，木杆转起圈来。随着制秤人握横杆的一催一松，再移位一催一松，几个眼出现了，这就是定盘星，也称准星。

准星定好后，接下来就是计算杆秤的刻度了。所有的刻度都定好后，依旧一催一松地钻眼。钻好眼后拿出一根软软的金属丝来，左手将金属丝往刚钻好的眼里一送，右手拿着一个方方的铁块贴着木杆将金属丝扫断，又在眼上轻拍一下，金属丝再去堵下一个眼。制秤人再拿起一把刷子，从小罐里蘸水刷在木杆上，这样秤就制好了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制秤匠陆师傅，他也是这家制秤铺子里的“大拿”。陆师傅制秤，强调一个准，他常对几个徒弟说，秤就像一个人的心，心正秤准，心歪了，秤就不准，因此他从选料开始，每一个步骤都毫不马虎。制秤工艺精细、工序繁多，其中又有关键工序，如木材的选料、星位的刻度、提绳的定位、秤砣的铸造等，一般都由陆师傅亲自把关。

陆师傅有一个叫郭雨的大徒弟，此人读过几年书，比较机灵，深得陆师傅的器重。在秤的制作中，有些重要工序都交给郭雨。一天，陆师傅当着铺里所有

人的面，黑着脸指着工作台上几支成品秤杆，“啪”的一下折断，扔给大伙说，你们都看看，用次木料充当好木料，这是谁干的？郭雨在师傅和师兄弟的目光逼视下，不得不承认了。原来，制作秤杆的木料很有讲究，一般要用硬杂木，选择纹理细、直、无疤的木料，再用蒸或浸泡的方式进行处理。否则，秤杆就会弯曲变形，影响秤的精度。

如今，虽然秤的模样已改变了，各种精密的电子秤层出不穷，但原理并没有变，交易的准则没有变，秤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